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化范式的重构

李萌 潘家华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005)

【摘要】: 文明是文化的历史积淀, 文化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发展历程, 也是生态文化范式不断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不同文明背景下的生态文化在本质、理论及方法等方面有着各自的典型特征, 深刻认知生态文化范式的转换规律, 是精准把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本质的内在要求。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驱动现代生态文化范式向新时代生态文化范式转换, 在范式转换过程中, 既要结合当前的文化、社会、经济及科技等要素特点进行创新, 也需要传承传统生态文化范式及现代生态文化范式的合理内核。新时代生态文化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均带有鲜明的生态文明时代特征。在本质上, 生态文化是把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上升到文明高度的现实反映, 并成为国家核心型文化; 在认知上, 强调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 从“饥饿恐惧文化”向“健康忧虑文化”转换; 在方法上, 更加重视智慧技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技术方法与手段的应用。

【关键词】: 生态文明 生态文化范式 解构 重构 传承 合理内核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21)12-0020-09

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是中国对世界生态环境保护理论与方法的重大创新。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的。研究中国生态文化范式的解构与重构问题, 有利于系统且清晰地认知生态文明的本质, 以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及文化渊源。

生态文化是指以崇尚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资源永续利用为基本特征, 能使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谐共进, 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生态文化”^[1], 从“范式转换”视角研究中国生态文化, 有利于更精准把握生态文化的内涵及演变规律。托马斯·库恩认为, 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2]。生态文化范式的本体论主要探讨“生态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及本质是什么, 生态文化范式的认识论主要是对生态环境保护及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的认识, 生态文化范式的方法论主要是针对保护生态环境及可持续利用资源实践方法的认知。

每一种新的生态文化范式的形成, 都是在解构前一种生态文化范式的基础上重构而成。生态文化在解构与重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自我否定, 同时传承“合理内核”, 这是人类思维的螺旋式上升^[3]。研究中国生态文化范式的解构与重构问题, 重点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不同时期的生态文化范式特点; 二是解构生态文化范式的驱动力及过程; 三是重构生态文化范式的创新及合理内核传承问题。

一、研究背景与综述

作者简介: 李萌,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潘家华, 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研究员, 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

基金项目: 贵州省 2019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重大课题“贵州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化建构研究”(19GZGX0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应急管理建设研究专项项目“我国生物安全治理体系构建中部门权责划分及协调机制建设研究”(20VYJ053);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发展绩效评估及对策研究”(2020STSB02)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主要经历了传统生态文化范式、现代生态文化范式及新时代生态文化范式三种生态文化范式。传统生态文化范式诞生在农业文明时代，当时的生态文化处于萌芽及自发状态，其特征是以生态安全为主，是民众对劳动及生活实践的直觉认知。现代生态文化范式出现在工业文明时代，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也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过程，这一时期的生态文化属于“发展优先”理念下的生态环境保护文化。新时代生态文化范式则是生态文明(后工业文明)时代需要重构的文化，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及剧烈的气候变化等问题使人们逐步认识到，不尊重自然规律，无节制地破坏生态环境，将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需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解构现代生态文化范式与重构新时代生态文化范式的过程中，既要结合当前国内外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环境及资源等要素的最新发展成果及研究进展进行创新，也需要深刻认知生态文化范式转换的规律与特点，准确把握并传承以往生态文化范式的合理内核，不能任意修正甚至歪曲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化范式原本的内涵，从而人为地过度拔高或贬低其价值。

在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认知与传承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现过以下两个误区：一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百废待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及科技的发展均落后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迫切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尽管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也强调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在“破四旧”等的影响下，包括传统生态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许多被破坏。二是泛化传统生态文化价值。在我国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后，由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理念同传统生态文化的“天人合一”等一些认知接近，在传承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过程中，开始出现过度泛化其价值的现象，要么生硬地提升其理论高度，要么探讨其落后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意义。泛化传统生态文化价值的误区有多种表现，例如：有观点认为，“五行相生相克辩证自然观内在把握了万物相互依存的规律、世界万物复杂性的非线性联系”^[4]，在中国传统阴阳五行理论体系早已被近现代科学体系所取代的背景下，这种认知实际上是对传统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缺乏深入的把握；有研究者把“布依族人家里用水都用石水缸或者木缸、瓦缸盛水，所需用水都用杉木水桶到水井或河流取”^[5]，这种生活方式描绘为“诗意地栖居”，并认为可以作为人与自然环境的美学建构的基本框架^[6]。问题是，尽管这些习惯很环保，但却是过去的较为落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态文化是不具备传承价值的。在科技、交通及通信较为发达的当代社会，生态文化的地域性及民族性特色将逐步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共同性的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但现有一些研究者要么对传统生态文化的消失危机表示担忧^{[7][8]}，认为新时代生态文化要体现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传统化^[9]；要么认为传统文化体系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持久性，能够被长期地习得、传播与实践。^[10]这实际上是对生态文化范式转换缺少深刻的认知。这种错误认知不仅同社会发展规律相违背，在实践中也难以操作。

人们对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不同时代下的生态文化认知，也出现一些误区：一是不承认工业文明时代下有生态环境问题及发展优先的认知误区。改革开放前后一段时期内，国内主流观点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痼疾，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这一问题^[11]。后来尽管人们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严重性，但生态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发展优先理念所左右。二是把生态环境破坏及发展优先理念视作工业文明时代的自然属性。这种认知很难解释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文明背景下完成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向“敬畏自然”的转变。工业文明的典型特征是近现代科技的应用，并不必然导致发展优先理念，发展优先理念的产生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科技是双刃剑，既增强了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能力，也提升了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结果的好坏关键在于应用科技的人，而不是科技本身。三是用“保护生态环境”来界定所有时代的生态文化。这种观点没有从发展的视角认知生态文化，从本质的角度来看，传统生态文化以生态安全为主，工业革命后出现了日趋严重的生态破坏及环境污染问题，人们才重视生态与环境问题。

我国之所以在生态文化的认知与传承方面不断出现偏差，究其原因，既有认知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及深化这一客观原因，也有对生态文化研究不足的主观原因。尽管人们对生态问题的文化认知出现很早，但国内外针对生态文化的研究较晚，国际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生态文化”这一概念的是环境保护运动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切伊^[12]，国内明确提及并针对生态文化的研究开始于1989年前后，由余谋昌^[13]、周义澄^[14]及高惠群^[15]等学者较早关注并进行探讨。

在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方面,最早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李春泰^[16]等人进行的研究。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虽然较多,但存在研究范围较窄的问题。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研究基本都是在探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敬畏生命”“取用有节”“以时禁发”“仁民爱物”“俭而有度”^{[17][18][19]}等认识论方面的内容,研究结论也基本都是认为,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提倡尊重自然规律,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及可持续利用思想^[20]。二是探讨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思想,相关研究几乎涉及到中国的各个民族,该类研究基本都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观既有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一般性,又大都具有各民族的特殊性。尽管相关研究有一定深度,基本观点也大都是正确的,但大量研究都是重复性的工作,创新不足。

生态文化不单是文化问题,还同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要素相互交织。但现有研究大多都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较少从技术范式转换,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转换,以及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时代转换等视角进行跨学科研究。对三种生态文化范式也缺少系统性的归纳与分析,要么研究传统生态文化,要么研究现代或新时代的生态文化,也有少数研究文献提到生态文化的范式问题,但主要侧重于传统文化^{[21][22]}。现有一些研究认识到我国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过程中生态文化的价值^[23],且基本都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当代中国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提供借鉴^{[24][25]},但这些研究较少明确区分及对比工业文明时代与生态文明时代下的生态文化的差异性,只是简单地把生态文明时代下的生态文化称为“新时代的生态文化”。在对生态文化分类方面,现有研究大都倾向于把生态文化划分为生态观、生态伦理、生态法制、生态习俗及生态禁忌等^[26],或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精神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较少从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角度进行研究,这不利于准确认知不同时代的生态文化的演变规律。加强中国生态文化范式的解构与重构问题研究,既是创新我国生态文化研究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需要。

二、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由人类长期经验积累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与历史的积淀物。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主要是指受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深刻影响之前的生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以下特点:家国观念及重群体、轻个体的伦理传统;重礼治、轻法治的政治传统;重人道、轻天道的思想传统;重直觉感悟、轻理性思维的认知传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生态文化也带有这些文化基因。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治国理政之间也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关联^[27],在谋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挖掘传统的优秀文化资源,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也尤为重要。

从文化的生态要素溯源来看,由于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生态环境学,对生态环境的认知主要是对长期实践经验的归纳与总结,并融合在习俗、神话、乡规民约及“儒释道”思想等传统文化中。在本体论方面,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是以生态安全为主的生态文化,并以民间文化为主;在认识方面,主要以“天人合一”等朴素自然观构成;在方法论方面,主要是基于法规、宗法及神秘信仰相结合的管理方法,以及积极开发利用自然的精神。

(一)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本体论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是带有农业文明时代特征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及科技观下的文化。在本体论方面,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尚不涵盖当前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以民间文化为主要载体。

一是以生态保护为主的生态文化。在农业文明时代,由于生产力相对落后,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有限,整个生态系统处于自然平衡状态,生态环境处于“原始型环境美好”状态,较少有土壤污染、大气污染及水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传统生态文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以及水土流失、洪涝灾害等生态保护领域。

二是以民间文化为主。民间文化是由劳动大众创造的、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文化。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主要以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艺术及伦理道德等形式存在,整体上属于民间文化。尽管有“天人合一”等被广泛接受的思想理念,以及重视抗灾救灾的文化传统,但在传统官方文化体系中,生态文化本质上不属于主流文化,更未被上升到国家意志

的高度。

(二)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认识论

中国古代对生态环境的认知主要包含“天人合一”观、“道法自然”观、“万物有灵”观、“相生相克”观、“取用有节”观及“敬鬼神而远之”观等。一些传统认知既是理论也是方法，难以明确区分，如“取用有节”观、“敬鬼神而远之”观等。

“天人合一”，或称“天人合德”“天人相应”“天地人和”，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天人合一并非中国文化所独有的观念，在世界很多宗教中都有这类观念。

“道法自然”一词来自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认知，该理念认为，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存，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要尊重自然规律。

对于“万物有灵”观，可以从两个视角进行理解：一是认为万物都是带有灵性的生灵，需要平等共处，尊重生命。二是“神话自然”，即把自然灾害看作是山神、河神、雷神等各类自然神的愤怒与惩罚。以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为例，在当地民众观念中，保护水源的清洁卫生，也是为了避免因污染水源而导致神灵震怒降灾、洪水泛滥。^{[28]46}

“万物相生相克”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的一个重要认知。古代阴阳五行学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世间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并相生相克，五行相生。《道德经》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其核心是万物相生。

“取用有节”则是一种基于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可持续利用自然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要“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劝君莫食三月鲫，万千鱼仔在腹中；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敬鬼神而远之”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信命但不认命，崇尚积极主动地开发利用各种资源并应对各种自然灾害。由于知识体系的局限，中国古人无法解读自然灾害等很多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深层次根源，往往把其归为神灵或神秘力量。尽管中国古人也信仰各路神灵，但大都是有事了才“临时抱佛脚”，与其说是求神保佑，不如说是对自己的努力能获得一个好彩头的期许。

(三)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方法论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方法论主要是人们对生态环境管理过程中采用方法的文化认知。任何实践都有其理论基础，阴阳五行等理论是中国古代认知世界的基础理论，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特征，这些元素也均体现在古代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中。

一是以阴阳五行理论为代表的理论解读。阴阳五行、理气说等理论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基础，并以此为基础来认知与分析世界的运行规律。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也利用这套理论体系来解读多种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及生态问题，带有中国传统的文化特质。清末以来，西方近现代科学体系逐步取代了中国传统有关世界的认知体系，传统生态文化的理论基础才被逐步解构。

二是基于法规、宗法及神秘信仰相结合的管理方法。中国古代的生态环境管理实践，一方面是通过政府发布一些保护生态环境的政令，另一方面是依靠乡规民约及宗族制度来实现。民间的生态环境管理方式主要是通过明确的约束手段、带有敬畏的自律手段、群众性的监督手段及扬善惩恶的激励手段来实现，其中，诅咒、禁忌及惩罚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例如，贵州的苗族、侗族、水族等民族将生态伦理、生态维护与宗教信仰融为一体，通过“鼓社制”“议榔制”“习惯法”等手段保护土地、山林、河流。苗族村寨在制定榔规榔约的时候还多了一道巫文化程序^{[28]46}，具有“神性”的生态文化通过各种规约和社会礼仪来表

述^[29]。

三是不向恶劣自然环境低头并积极开发利用自然的精神。尽管大多数古人相信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头顶三尺有神明”，但当时更多的人也提倡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求神不如求己”“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流，靠自己永远不倒”，相信只要够强，自己就是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且山川、草木、鸟兽及人杰皆可成神，从神农氏、药神到吕洞宾等大多数神仙皆是凡人修炼而成，这与其说是对神灵的迷信，不如说是对强者的崇拜。基于这种认知，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也是同水涝灾害等各种天灾人祸作斗争的历史，人们在不断丰富完善传统生态文化的同时，也积极用其指导着具体的实践。

(四)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实践，但黄河在历史上十年九涝，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长期得不到治理，这些事实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实践在效果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当时的生态环境质量并不像一些研究者所形容的那样“诗意”。中国古代之所以没有大规模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及土壤污染，并不是因为生态文化及其实践多有效，更多的是源于生产力落后导致的对自然环境破坏力度有限。从现代科技的视角来看，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在理论认知上存在诸多错误，由生态系统、生物链、生物圈及绿色基础设施等构成的现代生态环境理论也给生态文化赋予了全新的知识及理论基础，但不可否认基于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的传统生态文化依然存在一些合理的内核。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认识论方面，“天人合一”观、“道法自然”观、“相生相克”观、“取用有节”观等，也就是当前提倡的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可持续利用自然的理念。当前生态理念同古代神话自然的区别在于，当前尊重自然及顺应自然是指尊重自然规律，而不是敬畏各路神明。二是在方法论方面，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是自强不息的精神、重视知行合一的态度、民间组织与民众基于敬畏形成的自我监督管理手段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

三、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现代生态文化

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现代生态文化主要是指工业发展模式下的生态文化。中国现代生态文化是在解构传统生态文化基础上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范式向现代生态文化范式转换的重要驱动力。在生态文化的本体论方面，生态文化的本质从生态保护文化转向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文化，从民间文化逐步上升为国家文化。在理论层面，发展优先理念是现代生态文化的典型特征，发展优先文化产生的文化根源是“饥饿恐惧文化”。随着西方近现代科学体系取代中国传统的基于阴阳五行的认知体系，中国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文化也从“神话自然”向“神话科技”转变。在生态环境保护实践方面，也从古代的宗法及乡规民约管理为主向现代依法管理转变。

无论是在理论分析或实践认知方面，中国现代生态文化都远远高于传统生态文化，但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经济利益至上及发展优先；二是对自然缺乏敬畏之心；三是诚信的缺失；四是认为科技万能，过于重视“灰色技术”；五是官本位思想导致的伪生态文明建设；六是群众监督文化的弱化。

(一) 生态文化的本质从生态保护文化转向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文化

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生态文化都有着重视生态安全的共性——在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的基础上保障人的生命与健康安全，不同之处在于现代生态文化还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随着我国由农业时代逐步向工业时代迈进，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符合环境经济的发展规律，在生态文化方面，也经历了从漠视生态问题到重视生态问题的过程，并由以关注生态问题为主向全面应对生态环境问题转变。

(二)从民间文化逐步上升为国家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生态文化的存在感较低,不属于主流文化。现代微观经济学的资源稀缺理论认为,在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过程中,资源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稀缺性所决定的,越是稀缺的资源其价值往往越大。在中国古代社会,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有限,良好的生态环境并不是稀缺资源,传统生态文化难以发挥较大的影响力。随着生态破坏及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良好的生态环境逐步成为稀缺资源,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也成为国家政策法规重要的关注焦点与建设内容,生态文化也实现了从民间文化向国家文化的转变。

(三)“饥饿恐惧文化”影响下的基于发展优先理念的生态环境保护文化

在传统生态文化诞生的年代,物竞天择的残酷自然环境给人类的生存带来较大威胁,当时的生态文化主要是关于如何保障基本生存与发展权的文化。几千年来,“饥饿恐惧文化”深入中华传统文化的骨髓,这导致中国人重视存钱存粮,强调“家中有粮心中不慌”,见面打招呼关心对方“吃饭了没有”。在“饥饿恐惧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人们对发展的渴望及诉求被排在首位,工业文明时代下的生态文化之所以强调发展优先,是有着浓厚的文化基础的。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尽管人们的温饱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但“饥饿恐惧文化”依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之所以在我国基本实现小康社会前才被提出,也是受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

(四)从“神话自然”向“神话科技”转变,从敬畏型生态文化向自信型生态文化转变

生态文化受科技发展的影响较大,在科技发展水平较低的古代社会,“神话自然”是生态文化的典型特征。工业革命后,传统生态文化的认知基础被逐步解构。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技术革命进一步延伸与替代人类的手工劳动,解构手工业文化,重构了大规模集中式工业文化范式,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时代。在生态文化方面,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极大增强解构了生态文化的神秘性,形成了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为代表的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者”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理论。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环境保护又逐步成为生态文化的核心。法国思想家阿尔贝特·史怀泽“应对所有的生命意志采取敬畏生命的态度”^[30]的思想是生态伦理学的基石,开拓了生态伦理的先河。对中国来说,工业技术的进步也推动了社会组织管理机制的发展,加强了不同区域的人员流动及文化交流,传统生态文化的神秘性、宗法性、地域性、民族性及群众性等特征被逐步解构。

随着科技的进步,绝大部分自然灾害都可以用现代科技知识进行解读,加之无神论及唯物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国传统的鬼神信仰逐步失去根基,诸多基于神秘信仰的传统生态文化被否定。由于存在“科技不足恐惧症”,“神话科技”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中国主流文化认知。在一些西方国家反思科技双刃性的时候(如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¹的理论反思),中国社会正在强调“人定胜天”。这导致中国生态文化的认识从一种神话走向另一种神话——从“神话自然”走向“神话科技”。神话自然容易导致对自然的畏惧之心,产生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神话科技则容易产生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忽视或藐视自然规律。

(五)从宗法及乡规民约管理为主向依法管理转变

中国古代有以家族、宗族为核心的形而上礼制传统^[31]。在传统生态文化中,乡规民约及宗族制度是有处罚权的,不仅可以采用经济制裁手段,甚至能决定宗族内人员的生死,权威性较大。在现代行政管理体制及法制框架下,民间组织的主要作用是监督,但不具有处罚等执法权。随着带有乡民自我管理色彩的“习惯法”及带有神秘色彩的信仰等传统组织管理方式被解构,民间组织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也在弱化。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也强调政策法规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官方机构与民间组织相结合等手段,但民间组织及民众监督不足问题一直难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四、重构生态文明时代的中国新时代生态文化

生态文明时代下的生态文化是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确立后的生态文化，属于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生态文化。从农业文明时代到工业文明时代，驱动生态文化范式转换的力量主要是科技的发展，从工业文明时代到生态文明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中国现代生态文化范式向新时代生态文化范式转换的主要驱动力。

重构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生态文化，既是解构中国现代生态文化与传统生态文化的过程，也是传承其合理内核的过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丰富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土壤，蕴含了深邃的历史观。^[32]新时代生态文化在主体论方面，从一般性国家文化向核心型国家文化转换；在认识论方面，从自信型生态文化向反思型生态文化转变，从“饥饿恐惧文化”向“健康忧虑文化”转换，可持续的、有韧性的从发展优先理念下的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向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文化转换。其中，资源稀缺、生态环境资本、生态环境资产及生态环境生产力等理论是重构当代生态文化的重要理论支撑；在方法论方面，由于文化偏重于精神和规范，而文明偏重于物质和技术，因此，针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文化方法论更加重视智慧技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技术方法与手段的应用。

(一)从一般性国家文化向核心型国家文化转换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中央相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等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进一步确立，生态文化的地位也从现代一般性国家文化上升到国家核心文化的高度，同创新文化、和谐文化等一起成为当前的主流文化。

(二)从自信型生态文化向反思型生态文化转变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我国开始进行生态文化的反思。尽管生态文明时代下的生态文化的核心依然是生存与发展，但它既不同于农业文明时代下的挣扎型生存与发展文化，也不同于工业文明时代下以人为中心并强调征服自然的自信型或者说膨胀型生存与发展文化，生态文明时代下的生态文化是建构在人类已有能力打破全球生态系统平衡并已实际带来气候变化等问题背景下的文化，这种生态文化属于反思型生态文化、自我救赎式生态文化，是对生态环境破坏及其带来危害的自我反思。

(三)从“饥饿恐惧文化”向“健康忧虑文化”转换

随着中国进入小康社会，深入中国人骨髓的“饥饿恐惧文化”逐步被“健康忧虑文化”所替代，“饥饿恐惧文化”强调发展优先，“健康忧虑文化”则更重视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时代下的生态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强调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要守住生态环境和发展两条底线”。发展与保护协同的生态文化以建设人和自然共生共荣、和谐发展为本目标。一些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科技方面发达，生态环境质量也较好，这种环境美好属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赢的“可持续的、有韧性的环境美好”，明显异于一些经济社会较为落后但环境美好的国家，那种环境美好是“未开发、原始性的环境美好”。例如，不丹是一个碳排放为负的国家^[33]，但也是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四)资源稀缺、生态环境资本、生态环境资产及生态环境生产力等理论是重构当代生态文化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稀缺资源背景下，人们逐步形成了生态环境资本、生态环境资产及生态生产力等新的理论认知，生态文化也需要随之进行相应的创新。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态系统与生命共同体理论，该理论认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二是尊重自然规律理论，该理论认为，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三是生产力理论，该理论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重要的资本与资产，“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四是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良好生态环境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又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提供支撑，“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这些理论认知是重构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文化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及基础，也是对

以往生态文化理论的重大创新。

(五) 传承传统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生态文化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于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具有重要价值^[34]。要构建生态文明时代下的新时代生态文化，不仅需要传承现代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也需要积极传承传统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这既是文化知识发展的要求，也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的需要。

一是传承天人合一理念，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及可持续利用自然的理念。古代社会的发展大都是基于可再生资源，具有可持续性。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人类对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按照工业文明下的发展模式及发展趋势，地球资源是不足以支撑人类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应对这一危机，人们需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及可持续利用自然”的理念。“天人合一”“取用有节”“不涸泽而渔”等传统生态文化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今天及未来依然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这既是对传统生态文化合理内核的传承，也是对长期轻视自然规律思想的矫正。

二是传承让民众形成敬畏之心的方法，构建知行合一的生态文化。传统生态文化主要采取伦理道德、宗法及神秘信仰相结合的管理方法。神秘信仰及神灵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无所不在的监督及奖惩，“头顶三尺有神明”是指神的监督无所不在，“报应不爽”则主要是神灵能很好地进行奖惩。在传统神灵信仰被解构的背景下，民众缺乏敬畏之心，在行动上也容易产生知行分离问题。传承让民众形成敬畏之心的方法，需要构建政策法规、智慧技术、伦理道德及群众监督等要素相结合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约束机制，政策法规及伦理道德主要是明确奖罚，智慧化及群众化的监督主要是明察秋毫。当代的敬畏之心不是对神灵的敬畏，是对民众的敬畏——群众看着，对科技的敬畏——天眼盯着，对舆论的敬畏——伦理约束着，对政策法规的敬畏——法规震慑着。

三是传承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灰色技术”与“绿色技术”的结合。化肥、农药等现代科技手段的使用，极大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过度使用现代科技手段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例如：农药的过量使用不仅污染了土地、水源，也使一些传统益鸟、益虫难觅踪迹；在河流、海岸沿线大规模构筑水泥梯坝，导致湿地损失殆尽，严重破坏原来的生态系统。在国际上，近年来一些国家在持续重视“灰色”手段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手段的现代价值，绿色基础设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35][36][37]}等理念的出现就是典型代表。

五、结论

文化兼具传承性与发展性，农业文明及工业文明范式下的生态文化被解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国要重构生态文明范式下的生态文化体系，既需要深刻认知生态文化范式转换的基本规律，也需要传承以往生态文化范式的合理内核。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以生态安全为主，并多以民间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神秘性、民族性、地域性、宗法性、群众性等特点。传承传统生态文化的合理内核有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但农业文明范式下的传统生态文化观有些并不适用于现当代，应基于发展的视角科学认知传统生态文化的转型与传承问题。

工业文明范式下的中国现代生态文化是在解构传统生态文化基础上重构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的本体从生态安全为主转向生态及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并由民间文化开始逐步上升为国家文化，可以说无论是在理论构建或实践认知方面，都远远高于传统生态文化，但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至上；二是对自然缺乏敬畏之心；三是诚信的缺失；四是夸大科技或神话的力量；五是一些“官本位”思想导致的伪生态文明建设；六是群众监督文化的弱化。

中国生态文明发展范式下的新时代生态文化，这是基于工业文明的现代生态文化不断发展并优化而来的。由于受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现代生态文化附属于发展优先文化，新时代生态文化则强调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同发展，正在从一般国家文

化转变为国家核心文化。中国的发展目标是成为经济强国、科技强国、环境美好的国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共享，这为我们新时代生态文化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在传承以往文化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不断深化新时代生态文化建设，同时要以新时代生态文化为抓手助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及美丽中国梦的目标实现。

本文的结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范式转换视角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文化溯源，研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文化范式的解构与重构、自我否定与合理内核传承等问题，有利于深刻认知不同时代的生态文化的本质及演变规律，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二是在生态文化的本体论方面，提出了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以生态保护文化为主，中国现代生态文化的本质是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文化，中国新时代生态文化从一般性国家文化转变成国家核心文化等观点。三是在生态文化的认识论方面，提出并研究了“饥饿恐惧文化”“健康忧虑文化”“科技不足恐惧症”“自信型生态文化”“反思型生态文化”等对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文化范式转换的影响。四是在方法论方面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中要传承古代让民众形成敬畏之心的思路，通过政策法规、智慧技术、伦理道德及群众监督等要素相结合等方法，形成让民众对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产生敬畏之心的文化氛围，找到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文化支撑的抓手。

参考文献：

- [1]廖福霖. 生态文明学[M]. 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2:301.
- [2]Thomas Samuel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 [3]欧阳志远.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及其现代意义[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5(7):40.
- [4]丁桂馨. 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时代转化[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20(3):21.
- [5]谢仁生. 贵州布依族生态文化研究[J]. 理论界, 2012(11):66.
- [6]李波. “低碳”视域下的贵州黔东南苗族生态文化探析[J]. 理论与当代, 2010(7):29.
- [7]吴平.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生成风险与传承危机对策研究——以贵州黔东南为例[J]. 原生态民族化学刊, 2012(4):126-127.
- [8]杨美勤,唐鸣. 民族地区传统生态文化的现代困境与转化路径研究——基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调查分析[J]. 贵州社会科学, 2019(3):94.
- [9]王立. 新时代生态文化建设研究[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78.
- [10]蒋萌. 贵州布依族传统生态文化中的当代价值——以镇宁高荡布依族古寨为例[J].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77.
- [11]陈学明. 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11):17.
- [12]佩切伊. 21 世纪的全球性课题和人类的选择[J]. 世界动态学, 1984(1):99-107.
- [13]余谋昌. 生态文化问题[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89(4):1-9.

-
- [14]周义澄. 中国经济改革的生物圈保护问题以及全球生态文化观[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4):64-68+63.
- [15]高惠群. 苏联学者论生态文化[J]. 今日苏联东欧, 1989(5):40-43.
- [16]李春泰.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关系——兼论对正在崛起的生态文化的价值[J].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4(10):41-44.
- [17]张宏斌, 黄金旺.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及其现实意义[J].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 2020(5):27-28.
- [18]朱凤琴.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思想的现代阐释[J]. 科学社会主义, 2012(5):100-102.
- [19]罗志勇.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的生态公正思想探析[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48.
- [20]侯帅.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与途径[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3):172.
- [21]冯永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范式与生态文明建设[J].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1):47-49.
- [22]王真. 生态文化——一种新哲学范式的转换[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4):181-185.
- [23]刘政. 生态文化对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影响[J]. 新乡学院学报, 2018(2):13-15.
- [24]梁红军, 张颖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的当代转化与实践路径[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5):32-33.
- [25]卢晓莉. 基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视角的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J]. 生态经济, 2017(8):214-218.
- [26]喻见.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与生态问题论析[J]. 贵州社会科学, 2005(3):36.
- [27]沈小勇. 中华传统德治文化的价值意蕴与当代重构[J]. 贵州社会科学, 2021(3):12.
- [28]吴媛姣, 蒙爱军, 冯毓杰. 贵州传统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J]. 教育文化论坛, 2014(2).
- [29]蔡熙. 论贵州苗族诗意栖居的生态文化内涵[J]. 鄱阳湖学刊, 2013(5):115.
- [30]邢启顺. 贵州苗族生态文化简析[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07(2):25.
- [31]阿尔贝特·施韦泽. 文化哲学[M], 陈泽环, 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307.
- [32]李禹阶. 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变[J]. 中国社会科学, 2020(6):192.
- [33]李孝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内涵与理论渊源[J]. 江淮论坛, 2019(1):94.
- [34]UNDESA.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The Future is Now, Science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OL]. (2008-09-23) [2021-09-20].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gsd2019>.

[35]李潇翔,刘爱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J]. 江淮论坛, 2021(2):93.

[36]World Bank.Biodiversity,Climate Change and adaptation:Nature-Based Solutions from the World Bank Portfolio[R/OL]. (2020-04-06) [2021-09-20].<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7785>.

[37]European Commission.Towards An EU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olicy Agenda for Nature-Based Solutions&Re-Naturing Cities[R/OL]. (2015-03-23) [2021-09-20].<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fb117980-d5aa-46df-8edc-af367cddc202>.

注释:

1 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1964年出版了《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One-Dimensional Man: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一书,该书的主要观点是,发达工业社会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成为单向度的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